

马克思主义哲学

符号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及精神异化特质探析^{*}

范宝舟 董志芯/文

提 要: 目前,对符号拜物教的研究,更多是在与马克思拜物教思想的对比中进行,并且在其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异化特质的揭示上显得含混、抽象而不够明晰。本文认为,符号拜物教具体表现为意象拜物教、景观拜物教和能指拜物教。符号拜物教的异化特质深层次地表现是精神异化。符号拜物教带来的精神异化,根源不在于符号的自我运动本身,而在于催生符号运动的资本扩张逻辑。马克思拜物教思想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剖析符号拜物教视域中的精神异化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意象拜物教; 景观拜物教; 能指拜物教; 精神异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现象,以及贯穿其中的资本逻辑这一生成根源,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异化乃至人的全面异化的运动变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设计辩证统一起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扩张逐渐由对作为实体性的物的生产要素的吸附转向对作为渗透性的、无形的精神生产要素的吸附,直至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部纳入到保证自身增值的轨道上来,形成了对人类社会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在信息时代,由于生产的高密度设计、消费的精神需要升级,以及丰裕经济时代的到来产生了拜物教的新的样态——符号拜物教。符号拜物教具体表现为意象拜物教、景观拜物教和能指拜物教。符号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区别在于,统治人的力量从物转向了符码(围绕一定的意义所建构起来的符号体系),即,人们由对物的崇拜转变为对符码的崇拜。符号拜物教的异化特质深层次地表现是精神异化。精神异化对人的精神俘获而导致的人的心灵沉沦,消解了劳动异化中肉体痛苦刺激的反抗意识,从而不仅使人失去了对社会的自觉批判意识,甚至形成了资本扩张过程中人与资本的共谋关系。然而,符号拜物教带来的精神异化,根源不在于作为文化的符号运动本身,而在于催生符号运动的资本扩张逻辑。符号运动的形式因恰恰是资本的“道成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2BZX014)的阶段性成果。

身”。所以，马克思拜物教思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剖析符号拜物教视域中的精神异化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同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把商品、货币、资本作为人的崇拜对象一样，在符号拜物教那里，符号体系（符码）作为统治人的力量而被人们所崇拜。符号拜物教中符号体系所具有的统治力量，是由其自身显现出来的意义所撒播而成的精神场域所形成的对人的心理乃至人的心灵的统摄、俘获和征服。在消费社会，符号体系对人的心理乃至人的精神的统摄、俘获和征服通过意象、景观和能指这三种路径来实现。符号拜物教从而表现为意象拜物教、景观拜物教和能指拜物教。如同商品、货币、资本形成对人们丰富的社会世界的抽象一样，意象、景观和能指也形成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在这种抽象中，真实世界被遮蔽，而由意象、景观和能指所构筑的符号世界反转成为真实的世界，甚至是比真实世界更为真实而被幻想成为真实世界本身。由此，人们沉浸在由意象、景观和能指所构筑的符号世界之中而不可自拔。

其一，意象拜物教意指对作为直观者与商品相互交融而生成的完美符号意义的崇拜。意象拜物教在本雅明那里得到深刻阐释。本雅明认为，商品不是僵死的、无生命的物，而是一种富有内在灵魂的拟人化存在。商品在人们的直观中，深情叙说自身将会给直观者带来心理满足或精神尊严的美妙“故事”，直观者则在商品所叙说的美妙“故事”中想象、领会、感悟自身向往和理解的人生真谛和社会法则。意象就是在商品被人们所感知的那个瞬间的“灵韵”，就是在人与商品的直观中生成的促发人们想象和思考的某种精神气息。这种“灵韵”或精神气息，作为一种非实在性的、无法言说清楚的存在，凝结成为弥漫和充斥在人的周围给人以向往和渴望，并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牵引力的完美符号意义。意象拜物教的一般原理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象作为直观者与商品相互交融生成的完美符号意义，对于直观者而言，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并以此确立自身成为被崇拜对象的特权。商品就如波德莱尔般的诗人一样“享受着一种无以比拟的特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既成为他自己，同时又充当另一个人。他像迷失路径在找寻躯体的灵魂一样，可以随时进入另一个人的角色中”（本雅明，2005：54）。商品的灵魂所衍射出来的意象，就成为掌管这一特权的化身。因此，消费社会里，“偶像崇拜换了一种方式在自我诉说”（本雅明，2005：54）。意象在特定时空点赋予观者以独一无二、无可比拟、难以复制、转瞬即逝的精神享受，被人们所膜拜，实际上是人们对一种不可企及的精神氛围的心理迷恋；二是在本雅明那里，交换价值的移情是意象拜物教生成的根本路径。本雅明认为，具有了灵魂的商品最富有交换价值的移情能力。本雅明指出，“假如马克思偶然在玩笑中提到的商品灵魂真的存在的话，那它就是灵魂世界中能碰到的最富移情能力的一种”（本雅明，2005：53）。因为意象与其说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向人们言说自己特有的感情、故事和经历，毋宁说，这正是潮水般拥在商品周围并陶醉于它们的人群自身想要表达的情感。本雅明指出，“移情就是休闲逛街者跻身于人群中所寻求之陶醉的本质”（本雅明，2005：53—54）。这样，交换价值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和经济问题，而是与大众体验融合在一起，使移情从历史相对论者的发现层次转变为意识形态层次，成为展示现代人心底深处精神体验的本体论范畴，从而实现了交换价值与意象崇拜之间的双向循环建构。由此，意象拜物教通过大众体验向着个性、意愿、经历、思

想、情感等最具变化性的领域延伸；三是意象辩证法是克服意象拜物教的根本方法。所谓意象辩证法意指意象在其肯定性的存在当中包含着否定性的内涵，即意象具有自我异化和自我救赎的双重特征。因此，意象如同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一样具有自我颠覆的力量，从而在自身异化的同时实现异化的扬弃。这种异化的扬弃就在于意象作为神秘性的存在，使意象本身成为寓言式批判的对象，并通过批判使原本诸多颓废的意象获得一种启示意义，这种启示就是社会实现救赎的生长点。

其二，如果说本雅明意象拜物教凸显了作为人所面临的对象（商品）的“近”与对象（商品）言说出来的完美符号意义这一不可企及的“远”之间的辩证运动，那么，德波的景观拜物教，则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物化现实，而是实现了社会存在与表象之间的完美的分离，并由此裂变为一个供人景仰和崇拜的独立的社会景观王国。在德波那里，景观拜物教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一是景观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力量，是一切崇拜生发的现实场域。景观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虽然物质生产仍保持其客观性，但它根本上受着景象的操控。德波指出，“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决非偶然或表面的就是景观的，景观恰是这一社会根本性的出口……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德波，2006：5）。不仅如此，德波指出，“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aliénation）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德波，2006：4）。二是在景观社会中，活生生的价值被作为纯粹抽象价值的凝结状态的商品所占有，从而景观世界就是商品统治一切有生命物存在的世界。商品世界对真实世界的殖民化，成功地遮蔽了真实世界，成为拜物教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德波指出，“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l'occupation）社会生活的时刻。商品化不仅仅是可见的，而且那就是所见到的全部：所见到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德波，2006：15）。三是景观直接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德波指出，“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德波，2006：3），并且，“景观关系的那种拜物教和纯然客观的表象，掩盖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特性：一种带有其必然规律性的第二自然对我们环境的统治”（德波，2006：7）。四是景观拜物教生成的根本路径是意识形态物质化。在德波那里，景观作为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把商品原则所透视出来的意义世界看作是一切生命之物得以诠释、承认和存在的依据。德波指出，“景观——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德波，2006：99），从而景观作为物化的意识形态，成为全部意识形态的轴心逻辑，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德波认为，“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德波，2006：99）。

其三，能指拜物教作为对由能指飘移所构筑的“类像模型”的崇拜，是消费社会中拜物教的极端体现。能指拜物教的特点在于作为能指的声音和图画，不仅与现实世界不相干，而且还从作为概念的所指中抽离出来，具有自我繁衍的能力。比如，百事可乐广告让人联想到的能指链是“年轻”“性感”“受欢迎”“好玩”等等。能指与作为人与物、“远”与“近”交融的意象，以及物化了的世界观的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能指拜物教那里，自我繁衍的能指漂移所构筑的“类像模型”，具有统治人并被人们崇拜的强大力量。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消费社会中的能指拜物教进行了深度揭示。一是符号拜物教的本体论基础表现为符号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存在依据。鲍德里亚认为，物的真正内涵不是

其操持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其等价意义上的交换价值，而是遵循人的欲望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符号价值。鲍德里亚指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鲍德里亚，2008：58）。不仅如此，符号价值成为具有决定性地位的价值形式，因为符号的意义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以现实化的合法性工具；二是能指拜物教表现为对能指所构筑的标识社会地位的差异性符号的迷恋。能指拜物教主要是通过符号的操纵和编码，使得在对某种符号的占有与具有某种社会地位之间产生同一性关系，从而崇拜能指实质是追求更高阶的社会地位的表征。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消费者受到一种模型‘游戏’和其选择的规定，就是说受到他在此游戏中的组合蕴涵的规定”（鲍德里亚，2008：198）。也就是说，能指本身蕴涵着主导人们认识世界和行为选择的绝对力量。在符号秩序中，个体只能沉浸于对标识社会等级秩序的符号的凝视，沉浸于对社会地位能指秩序的追逐之中；三是能指拜物教的生成机制表现为能指操纵现实的自主漂移的逻辑。符号价值，作为价值的激进形式，不再遵循索绪尔“能指——所指”的语言结构分析框架，而遵循从能指到能指的符号自主的价值结构革命逻辑。这种价值结构革命的重要功能在于符号被解放，价值分析走入符号能指自身系统的内在运转逻辑上来。也就是说，符号价值是符号在自身系统内不依赖于任何参照价值，而具有一种自主性的自我运动。这种自我运动是按照一种随意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自由展开结构和组合的游戏。正如贝斯特和科尔纳指出的那样，“鲍德里亚宣布生产、分配、消费的整个周期被转化到一个抽象能指的符号系统之中，与客体世界没有关系”（贝斯特、科尔纳，2002：125）。能指自主漂移形成的意义世界对社会关系进行成功型塑，使其成为左右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绝对精神”。鲍德里亚指出，“我们将发现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的乃是能指的拜物教”（鲍德里亚，2009：78）。

二

符号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区别在于，统治人的力量从物转向了符码（内蕴意义逻辑的符号体系），即，人们由对物的崇拜转变为对符码的崇拜。符号拜物教带来的异化特质深层次地表现为精神异化。精神异化相对于劳动异化而言，以符码的完美意义逻辑这一无形的力量作用于人的心灵，产生令人着迷的距离感，以及导控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特权，因而对人而言具有更为强大和更为牢固的奴役和控制力量。因为精神异化对人的精神俘获而导致的人的心灵沉沦，醉化于符码所构筑的美妙的意义世界之中，消解了劳动异化中由肉体痛苦刺激和压迫所引起的反抗意识，从而不仅使人失去了对社会的自觉批判意识，甚至于形成了资本扩张过程中人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消费社会，资本逻辑带来了人的劳动异化和精神异化的双重异化。

符号拜物教带来的异化特质是精神异化，是劳动异化之外从资本逻辑中生成的新的异化形式。如果说劳动异化凸显的是对人的劳动的赤裸裸的榨取和对人的肉体的控制，那么，精神异化凸显的则是意象对人的精神的笼罩和俘获、物化了的世界观对人生目的的统治和“座驾”，以及能指的漂移所生发出来的“类像模型”对主体的编排和架构。符号拜物教带来的精神异化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精神异化直接体现为意义感的匮乏。精神异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在资本逻辑认可下的符码所建构的应然人生图景对自我实现的实然人生的一种牵引和诱惑。即，意义感的匮

乏表现为这种应然的人生图景与实然的现实人生之间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为实现扩张目的而不断构架这种应然人生图景所导致的意义感的匮乏是一螺旋式的循环存在。为此，人们不仅陷入感受和体验应然人生图景带来的快感和满足的无止境的追求，而且为了实现对这种应然人生图景的感受和体验而以意义的编码原则作为自身的行动逻辑。乔恩·埃尔斯特指出“精神异化或者可以被视为一种意义感的匮乏，或者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意义感的匮乏的感受”（埃尔斯特，2008：68）；其二，精神异化呈现出的是符码对人的心灵的诱惑。这种诱惑在消解传统意义上的异化所蕴含的对立和矛盾的同时，通过把符码转换成人的需要，进而转换成社会需要，从而使人们主动地崇拜符码世界。因此，精神异化不是以血与火的暴力形式来进行的一种对肉体的残酷摧残、对尊严的无情剥夺以及对自由的强硬钳制，不是拙劣地纯粹把人直接当作受制约的、无思想的客体来对待，而是带有深深的隐蔽性、技巧性和不易为人发觉的诱导性，即，它呈现为一种温柔的、甜蜜的、“游戏式”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摧残和剥夺。精神异化对人的控制和干预浸润到人的灵魂的深处，人们幽灵般地在符码世界里幸福地徜徉，充满母性的、祥和的氛围让人丝毫没有不祥之感，以致牵引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向而不给人留下任何痛苦的痕迹，规划着人的生存方式而不会导致人对它有任何的抵触、反抗和叛逆。德波指出：“只要需要是一种社会梦想，这一梦想也将变成社会需要。景观是被囚禁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表达的不过是这一社会昏睡的愿望。景观是昏睡的监护人”（德波，2006：7）；其三，精神异化表现为一种无批判的社会集体无意识行为。精神异化作为对符码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崇拜，深深地熔铸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之中。符码世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关于人的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客观化社会系统，即转换成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这种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作为客观精神撒播成为社会的文化场，构成人的生活直接面对的匿名性的先验存在。这种匿名性的先验性存在，是如此这般地描绘着人生的幸福梦想、如此这般地表达出对生活一切细节的“人性化”的周详安排、如此这般的把人看作是“上帝”，由是，这种匿名性的先验性存在不是驱逐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幻象迷雾，不是揭示其钳制人的本来面目，而是把这种幻象迷雾降临到人们生活的尘世，非辩证性地把它对所谓人性关怀的一面夸大到极致，由此割裂了与现实的关联，甚至与现实根本就没有关联，从而把人的本质力量从现实世界放逐到宗教般的符码世界之中。德波对景观的阐释深刻地表达了景观的这种隔离力量。他指出，“景观是一种将人类力量放逐到‘现世之外’，并使人们内在分离达到顶点的技术样式”（德波，2006：7），因此，匿名性的先验性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不仅使人陷入其中而失去了批判能力和反抗能力，而且使人被动的、单向度的把它作为自身的行动指南，即，精神异化表现为一种无批判的社会集体无意识行为。

精神异化不在对作为实体的商品物的崇拜中发生，而是在对符码的意义的迷恋中生成。因为符码具有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功能。符码在智能化媒介以及各种广告的运作下，对精神异化的生成起着催化作用。首先，借助对于符码的迷恋，并通过符码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精神异化生成的根本标志。精神异化，如同商品拜物教中商品对人形成统治一样，凸显为符码对人的统治。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鲍德里亚，2009：78—79）；其次，符码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功能，是精神异化生成的根本动力。凡勃伦认为，占有财富的动机并不在财富本身，而在于财

富对于人的社会等级差异性区分所带来的精神满足。因为财富使占有者拥有体面、令人尊敬和有身份等等荣誉感。费瑟斯通则进一步关注消费物的结构和消费方式所标识出来的社会等级。如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成为社会等级差异性区分的重要标准。在鲍德里亚这里，符码对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区分，不是凡勃伦式的通过物质财富的占有来体现，也不是费瑟斯通式的通过消费物的结构和消费方式来体现，而是在符码与符码之间的相互比较中完成。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并不遵循生产的逻辑，而是遵循社会的符码逻辑。符码的生产相比物质财富生产具有先验性的地位，在不同的符码的比较中彰显出人的不同地位、声望和等级。鲍德里亚指出，“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鲍德里亚，2008：62）；再次，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针对人的心理体验需求对符码进行运作，对精神异化的生成起着催化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服膺于资本扩张的需求，以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来运作符码，通过彰显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区分，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以促进资本周转速度的加快。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对符码的运作在本质上来看来是对社会地位的差异性的生产。反过来，社会地位差异性的稳定和固化促使人们对符码产生强有力的共鸣和认同。也就是说，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通过对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性的符码的运作，使得消费者、商品与符号体系之间形成完整的互训关系。即，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发生关系的缘由植根于符码的逻辑牵引力量。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以语言、画面、声音、灯光等来实现信息及其蕴含的意义之传递。商品的显现取决于它在语言、画面、声音、灯光等整体的符码运作中所处的位置。由此，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所运作的符码成为大众了解和认知商品的起点。商品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就在于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的运作，能否把与商品相应的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性的信息予以准确表达，并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心理体验需求。鲍德里亚指出，“每一幅画面、每一则广告都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即所有个体都可能被要求对它进行解码，就是说，通过对信息的解码而自动依附于那种它在其中被编码的编码规则”（鲍德里亚，2008：116）。因此，这种完整的互训关系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对商品的批判性认知上，也不是建立在对商品的客观性质的理解和把握上，更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对自身真实内心的体悟上，而是建立在对体现社会地位差异性区分的符码的运作之上。而且，为适应资本扩张对资本运转速度不断提升的要求，智能化媒介、各种广告，以及购物中心等对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性的符码的运作速度和技巧随之也得到惊人提升。

符号拜物教内含的精神异化批判，无论是对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揭示、资本扩张路径和资本形态变化的把握，还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视表象为本质的直接显现，精神异化着力于对操控人的心灵的客观精神世界进行文化批判，并希望藉此摆脱人的精神异化，回复到人自身的本真关系状态。这种解救路数在逻辑上带有鲜明的黑格尔三段论的色彩：原初状态——异化——异化之扬弃的乌托邦。比如，本雅明认为，“辩证思维是历史觉醒的关键”（本雅明，2005：187）。意象拜物教的消解在于辩证意象的自我救赎。又如，德波提出，“为了有效地消灭景观社会，……应通过发展景观批判变成自己的意识”（德波，2006：92）。再如，鲍德里亚试图通过构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来超越马克思，然而，他仅仅是赋予能指和符号体系以自我运动和自我繁衍的能力，并寄希望于以涂鸦的力量来驱逐符号价值走向象征交换。总而言之，符号拜

物教对精神异化的批判局限在文化批判的狭隘视域之中，是对生成资本主义病症的社会关系加以现实改造的一种逃避。

三

信息化时代，智能化媒体通过对符号意义的传播来驯化和改造人们的精神观念，这对精神异化的生成确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之所以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由短缺时代进入丰裕时代。然而，消费社会中，符号拜物教带来精神异化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实际上，符号拜物教在人的心灵深处所产生的精神异化，从追根究源的意义上讲，依然是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结果，只不过是资本形态、资本扩张方式和路径发生了变化而已。如果说在大工业时代，资本形态表现为物，资本扩张依赖于以作为物的生产要素为主的运动，那么，在消费时代，资本形态从物进一步拓展到文化，资本扩张进一步把文化要素纳入到自身增殖的轨道中来。即资本的扩张本性促使资本从依赖实体要素运动拓展到精神要素的运动上来，于是，资本从对肉体的有形控制转化到对精神的无形控制，从强迫性的压服转向到激发欲望的诱惑，从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转化为所谓的“文质彬彬”和“人性化”，从而使每一个人从灵魂深处臣服于资本。因此，符号拜物教带来的精神异化，根源不在于符号的自我运动本身，而在于催生符号运动的资本扩张逻辑。

其一，符号拜物教的生成不是意象、景观、能指自我运动的结果，而是深植于资本的扩张逻辑之中。资本扩张本性决定了它总是要不断地超越时间和空间障碍。即一方面加快资本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拓展资本增殖的新的增长点，实现空间上的超越。符号拜物教的出现，不是符号自我逻辑运动的结果，在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资本主体，一方面把符号作为资本扩张的新的增长点而不断地开发出来，另一方面信息、知识产权，以及创意、审美、差异性的意义等符号成为新的资本形态，构成资本扩张的新通道。因此，符号拜物教是资本借助符码展开的争夺消费者的斗争的结果，在其现实性上，是资本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必然要求。消费社会中，由于生产方式实现了由福特制积累模式向灵活积累模式的转变，资本周转时间加速，生产空间不断扩大。其产生的结果是：第一，造成了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既定实践活动的易变性和短暂性，但是短暂性越强，需要发现或者制造某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第二，商品生产的迅捷性特质不仅使商品的生命周期缩短，也使商品的新奇性迭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等人的存在方式，使人的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公共与个人价值体系结构也打上了暂时性、短暂性、流变性的特征；第三，资本扩张的触角延伸至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切领域，把从实体到精神的所有要素都纳入到为实现自身增殖的轨道上来。在消费社会，快速流变也就意味着要不断建构新的符号系统，甚至由符号系统所塑造的形象也变成了商品。所谓符号的独立运行、符号价值超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根源在于资本扩张本性本身。因为资本把符号直接投入到纯粹的流通之中，撒播到空间的每一个领域，使符码获得了君临上界的统治地位，通过符码不仅实现了时尚中的美与丑的转换、政治中的左派与右派的转换、信息中的真与假的转换、物体层面上的有用与无用的转换，以及自然与文化的转换，而且使道德、美学、时间判断力等文明标准和人文主义价值标准，都在图像和符码系统的自身运动中消失了。波德里亚指出：“这就是资本的普及化妓院，不是卖淫的妓

院，而是替代和互换的妓院”。(波德里亚，2012: 7)

其二，符号拜物教是资本为实现其扩张目标，对人的精神观念进行深度殖民的产物。资本，一方面以符号体系为利器，通过对人的需要乃至欲望的无限开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再挖掘，实现对人的精神的导控，从而为资本扩张寻找精神动力源。韦伯曾经就把世俗社会赚取财富的活动看作是上帝赋予人的使命，从而驱逐了人服从于上帝天国世界的人生价值观念。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西方经济学以人性自私的价值观为假设前提，在追求所谓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过程中，赋予资本扩张作为客观规律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 349—350)。商品对人的价值和意义从需要转向对人的享受需求的满足。享受和享受能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价值理想。马克思指出，“享受和享受能力是市民等级或市民社会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 101)，所以，“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 339)。在鲍德里亚早期著作中，他认为，资本竞争不仅体现在实体的物的领域，还体现在作为意义和价值的文化领域，因此，为资本扩张进行辩护的一切理由，都会以观念的形式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符码生产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诱惑起人的病态的精神享受欲望；另一方面，符号体系对人的精神的殖民是资本增殖的客观需要。文化商品化就是符号体系生产服从于资本增殖需要的典型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带有文化神圣光环的人被金钱所雇佣的文化商品化的初始现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广播、电视、小说等文化生产都服从于投资资本的理念。因为社会权力和商业机构对文化工业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所以，文化工业为消费者提供文化服务的同时，也将消费者图式化。他们指出，“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2003: 139)。因此，在消费社会，观念文化的生产成为资本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诚如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的那样，“商品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符号(文化)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鲍德里亚，2009: 143)。实际上，资本在消费社会中的运动过程，关键就是通过符号体系(作为文化的体现)深度殖民人的精神，以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符号拜物教对大众意识的统治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本质是资本对人的精神的统治，因为符号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意义领域。

其三，符号拜物教的生成还在于符码具有兑换现实物质利益的能力。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观念背后所蕴含的物质利益的诉求。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 82)；另一方面，符码对人的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区分，不只是停滞在对人的精神的满足上，而是在符码与现实物质利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即符码的意义除了给人以追逐物质利益以精神动力之外，它本身也具有参与分配社会现实物质利益的能力。所以，符码的意义不是鲍德里亚所阐释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只编目现实的单向度关系。实际上，符码与现实物质利益之间是双向建构的关系。这种双重建构可以实现一个人在符码与现实物质利益上的双重积累，形成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撑。一个人的尊严、身份，以及其拥有的各种符号(诸如各种头衔)的质量、层级等，不仅仅是标识其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且也是其占有包括现实物质利益在内的社会资源的重要筹码；再一方面，从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来看，消费社会中，生产的高密度设计也

呈现出符码的经济意义。拉什和厄里认为，消费社会中的生产是一个文化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不仅实现了知识的自反性积累和审美的自反性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自反性积累凸显了文化的经济意义。他们指出，“自反性是文化上的，积累是经济上的”，通过自反性积累这个概念表明了“经济日益向文化弯折，而文化也越来越向经济弯折”（拉什、厄里，2006：91）。因此，在消费社会中，符码对物质财富的生产，以及个人物质利益的获取来说，都不能被看作是空乏的道德说教，而是蕴含着对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利益和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的追求。

总之，资本拥有决定拜物教一切形态的主体性权力。资本的主体性权力是指资本对人的所有对象性形式、对象性活动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所具有的主导和支配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238—239）实际上，资本不仅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怎样分配等纳入到它自身的循环系统中来，而且还可以操纵政治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使之服务于资本的增殖意愿。在消费社会中，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把生产符码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条件、人力资源、传播媒介、科学技术、国内外市场、社会组织集中起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符码王国。而资本之所以具有主体性权力，就在于“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能获得这样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36）。在消费社会，物质的丰盛带来消费者选择空间的扩大，金融化重塑了人们的财富观，电视、报纸、网络等智能化媒介的普及等等，使资本改变了明目张胆的“羊吃人”的扩张模式，借助于虚拟资本、技术创新和对生活意义的话语权的掌控，为符号拜物教的生成提供了全新的机制。精神异化便是这种全新机制的必然产物。

参 考 文 献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人民出版社。
埃尔斯特，2008，《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鲍德里亚，2008，《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鲍德里亚，2009，《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贝斯特、科尔纳，2002，《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雅明，2005，《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波德里亚，2012，《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
德波，2006，《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3，《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拉什、厄里，2006，《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等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鉴传今）

·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Sign Fetishism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Spiritual Alienation

Fan Baozhou & Dong Zhixi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sign fetishism is in contrast to Marx's theory of fetishism. Its revelation in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and in alienation characteristic are ambiguous, abstract and less clear.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s of sign fetishism are imagery fetishism, landscape fetishism, signifier fetishism. The alienation characteristic of sign fetishism deeply manifests as spiritual alienation. The source of spiritual alienation that brought by sign fetishism is not with the self-movement of sign itself, but in the capital expansion logic that forced the sign movement.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in Marx's theory of fetishism still has very powerful and actual significance to dissect the spiritual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 fetishism.

“Center-periphery” Diffusionist Sketch or Historical Dialectic of Uneven Development?

Lin Mi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utlines the space-time reorganization proces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t is not only a process centered on the system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which the homogenization space is constantly generated, but also a process which could be able to continuously produce and reproduce the new space-time structur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ull of intrinsic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thought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Manifesto*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the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problem of the premise and result of historical movement in a specif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specific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problem;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problem of the way to transcend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uture.

“Nothingness” of Being and Emptines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On the Resonance between Heidegger's Thoughts and Buddhism

Zhang Zhiwei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orthy of discussion between Heidegger's “Nothingness” and Buddhist's “Emptiness”, the later of which also has real significance. As we know, the way of which Buddhism resisted Nihilism was to advocate “Emptines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Buddhist's solu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Axis Era, which mostly appealed to some kind of eternally ultimate entity. Heidegger, after two thousand years, explored the thought of “Nothingness” in